

近代底层农村女性的被物化命运

罗淑原名罗世弥，生于1903年，因产褥热死于1938年，年仅三十五岁。罗淑于1929年出国留学，在此之前先是在四川简阳念书，1923年转到成都一女师继续读书，1929年之前在四川生活的所见所闻成为她日后创作的素材来源。

在罗淑极短的三十多年的生命中，中国也正值近代最动荡的时期，战争、饥荒、社会变革纷沓至来，民间经受的动乱灾祸是司空见惯的。动乱时期，人命如草芥，抓壮丁、加收税款等压迫无处不在，而原本就处在弱势地位的女性在这种社会状况下，显然会承受更变本加厉的迫害，而最能概括这种迫害的词便是“物化”。

事实上，父权结构社会一直存在着对女性潜移默化的“物化”倾向，如我们听惯的俗语“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就能极准确地概括这种倾向。女性先是父权的所有物，出嫁后相当于被转让为夫权的所有物，“彩礼”与“嫁妆”则是这个转让过程中附带的利益交换。而在战争年代，文明与和平被破坏，加速了家庭对于物质利益的迫切需求，因此此时女性在家庭中的被物化倾向则暴露得更加明显，往往成为了可被交易的物品。在罗淑的代表作《生人妻》中，就直接地描写了农村的这种典妻现象。

《生人妻》中，男主人公是因家中状况越来越落魄而被迫将妻子卖给了他人，而更可怖的是这样一桩交易在文中所呈现出来的却是一个理所应当的选择，有买有卖有中介，除女主人公以外，所有人都自然而然地推动的这样一桩典妻交易的进行。当男主人公向九叔公提出卖妻想法时，九叔公的第一反应是“点着头微笑着说‘是个主意，包在我身上’。”当女主人公被买过去后，买家一家则欢欣鼓舞地为她换衣服、擦粉、起哄喝喜酒，全然是庆祝新婚的氛围，没有人为这是一桩人口买卖的罪恶交易而感到丝毫负面情绪，女主人公的被物化在此刻达到了顶峰。

典妻现象并非只存在于当时当日的四川农村，从封建时代到近代，在全国范围内都是广泛、隐晦却又理所应当地存在着的，这显然是最赤裸的对于女性的物化与羞辱，但在罗淑的创作中，不止这一点直接暴露了女性被物化的屈辱命运，男人在家庭中不对等关系的描写也向我们展示了当时的女性被置于第二性地位的现象。

譬如，在《刘嫂》中，刘嫂谈起她所嫁的男人，称“我一连找了三个男人，个个都打我……”“没有男人不打女人的……你爸不也打你娘么？”可见家暴不仅是当时极其普遍的现象，甚至普遍到了女人也默认应当如此的地步，当一个个体默认自己应当受到另一个个体的暴力与羞辱时，她就完全丧失了个体主动性与自我尊严，沦为了对方的附属与所有物。

罗淑将当时四川底层农村的种种女性遭受的苦难描绘出来，不仅仅是为我们展现了在落后年代底层农村的人物风貌，更使我们看到女性千百年来持续承受的被物化的命运。

四川民间底层女性的生存哲学

尽管我们可以非常直观地从罗淑的创作中看到女性遭受的不公命运，但我们仍然能从中发现一种蕴藏在深处，从不勃发却一直默默存在的生命力。

陈思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提到“藏污纳垢的民间”概念，也说“民间理想……是同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的所表现出来的乐观主义和对苦难的深刻理解联系在一起”，这也能应用于对罗淑创作的研究中。

作为四川籍的作家，罗淑创作中的女性也显然可以找到所谓“川妹子”的形象特质。《生人妻》中被典卖的女主人公没有甘于命运，而是在夜晚出逃归家；《刘嫂》中的刘嫂遭遇性侵与家暴，命运多舛，却仍然喝着酒活着；《轿夫》里那三个女轿夫“为了肚皮”抬着轿，她们身上不仅只是人们所谓的川妹子“泼辣大胆”的性情，更有在恶劣环境中对于生存的顽强追

求与坚韧的生命力。

在这些女性群像身上，我们也许看不到她们有什么智慧，看不到她们有任何觉醒，她们也许不识字，不读书，更毋论对“女权”的认知。但她们身上蕴藏的，却是女性在父权结构与动荡环境的双重压迫下，对于生存的执著渴求与生命的顽强坚韧，她们付诸行动，天真无知而莽撞坚强地生活着，正如刘嫂所说“过终究是要过的，好日子坏日子一样过，过不得也要过下去。”这些女性明知生存艰难，却仍蕴涵着一种乐观、韧性与生命的热情生活着。

在《刘嫂》的结尾，罗淑这样写到：“我相信一直到现在她仍然生活着，我祝福她这了解生活的人。”女性作为第二性的命运从古至今仍未变过，也不是战争或动乱结束，卖妻、性侵、家暴或别的物化行径就会消失，女性的生存是如此艰难而跌宕，但女性的觉醒与反抗却从未停滞，也许像海中航船一般，有被风浪淹没的时刻，然而也必然会有乘风破浪，重见光明的时刻。

女性在生存着，也许有人为了肚皮生存得莽撞苦难，有人为了抗争生存得清醒尖锐，但她们都有一套自己的、内化了的民间的生存哲学。我们祝福这了解生存之苦难但仍不屈地生存着的性别群体，摆脱第二性，真正坦荡平等地活在世上。

THE
END

感谢阅读。

